

1412
23

中国文字研究

ZHONGGUO WENZI YANJIU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第五辑

上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学科基金资助

卷五

010440100

中国文字研究

(第五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0771-5865797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9×1194 1/16 13.25 印张 543 千字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ISBN 7-5435-3953-5/G·3105 定价: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说明

1. 本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作为中心的专业学术期刊,本刊严格遵循教育部关于重点研究基地创办学术刊物规定的原则。

2. 本刊集中刊载中国文字学研究与应用的最新成果,竭诚为海内外文字学工作者服务,欢迎投稿。来稿可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也可通过邮局寄达(须附软盘)。如果文中有古文字出现,请做成图片 jpg 格式。来稿的文献数据请按国际标准期刊规范处理。

3.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请将有关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等的背景数据另页单独填写。审稿处理意见一般有如下三种:(1)全文发表;(2)修改发表;(3)不宜发表。

4. 2004 年 11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字学会年会,会议议题包括:(1)各类出土文字的调查、整理、考释研究;(2)汉字及各民族文字字库建设及其编码研究;(3)历史汉字的计算机数字化处理研究;(4)基于新手段和新材料的汉字发展史研究;(5)面向当今汉字规范、教学的历史汉字研究;(6)当代字辞书收字用字研究;(7)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用字研究;(8)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应用与管理。《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刊发的是提交大会交流的部分筛选论文。

5. 本刊得到上海市政府重点学科基金资助。

6. 本刊编辑部地址:

200062 中国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校内理科大楼 A 楼 213 室)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电话:021-62232050

传真:021-62232050

网址: [www. ideograms. org](http://www.ideograms.org)

电子邮箱: [wenzi@ ideograms. org](mailto:wenzi@ideograms.org)

目 录

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

——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	李玲璞(1)
汉字发生研究目的论	王元鹿(7)
汉字造字理论新说	梁光华(10)
《〈说文〉笺证》选录(一)	陈秉新(14)
《说文》辨正五则	杨 琳(16)
《玉篇》的层次	
——基于“《说文》《玉篇》《万象名义》联合检索系统”调查比较之一	臧克和(20)
《玉篇》知识库的建立和使用	王 平(23)
《玉篇》新增字测查报告	朱葆华(26)
宋本玉篇的今音标注问题	蔡梦麒(32)
宋本玉篇中“一曰”条例辨析	郭 瑞(39)
《干禄字书》正字的性质及其来源	刘中富(42)
《名义》音义舛拗考辨	吕 浩(46)
《佩觿》中汉字演化的思想研究	姜 燕(50)
论宋元明文字学家的假借研究	党怀兴(54)
古本《尚书》特殊文字例说	林志强(62)
《规范汉字表》对异体字的确定	张书岩(66)
谈辞书用字的几个问题	史建桥(80)
两岸用字的异同与 21 世纪的“书同文”	龚嘉镇(83)
汉字的内忧与外患	陆锡兴(89)
规范人名用字与保护公民的姓名权	陈双新(92)
1956 年以来更改的生僻县名用字研究	朱昌春(95)
古文字标准编码中的金文原形字字样整理	张再兴(99)
汉字部件与现代汉字部件规范	韩秀娟(105)
名词术语规范与文字学理论研究	沙宗元(110)
《现代汉语词典》对破读字的处理	李晓静 曲清琳(114)
商代字式简论	王蕴智(117)
《甲骨文合集补编》第一、二册释文文例商榷廿一例	刘海琴(127)
德方鼎铭文续考	张玉金(132)
金文语法札记五则	潘玉坤(135)

金文释词二则	陈英杰(140)
无终铜器研究	何景成(142)
释“𠄎、再、𠄎”	徐 山(145)
说字两则	杨泽生(147)
说楚简帛文字中的“𠄎”及其相关字	刘志基(150)
新蔡葛陵楚简札记	徐在国(155)
楚简文献的复音词研究	余 颖(157)
《孔子诗论》文字考辨五则	吴建伟(161)
从《尊德义》篇看“民可使由之”章	吴 昊(163)
平肩空首布四考	吴良宝(165)
先秦货币中的钱纹借用	陶霞波(168)
古玺文释读补议(三则)	肖晓晖(171)
古玺文字中的同形部件初探	朱 疆(174)
居延汉简的“乃”和“迺”	张国艳(176)
试论汉代镜铭中的简省字	李新城(181)
东汉镇墓文札记二则	吕志峰(184)
从出土车舆看“辅车相依”	汪少华(186)
“枪”和“抢”的衍变递嬗考探	徐时仪(191)
彝文规范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孔祥卿(195)
水文造字方法初探	高慧宜(199)
东巴文异体字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述评	周 斌(202)

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

——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

李玲璞

【摘要】 本文首次提出汉字学元点理论。汉字学元点的理论基础是汉语单音节语素与汉字成字的对应关系。汉字学元点理论概括的是,以汉语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的造字取象、成字造义的“物化”过程与以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的“物化回归”过程,包括在这个全过程中人脑的“中介思维”规律及其“迁移认知”原则。本文指出,汉字学元点在汉字学内部的各级各类系统中始终处于轴心的地位。以汉字学元点为轴心,能够有效地分析验证和评价汉字本体功能及相关问题,并能有效地辨识汉字认知方面的诸多误区。

【关键词】 汉字学元点;素物化;介思维;移认知;体功能

关于汉字学元点理论的考察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以单音节语素(音与义的结合体)为其基本语言单位的。如何把一个个单音节语素变成具象的可视的汉字,让有声语言跨越时空,扩大其交际交流思想的功能,先民们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①并没有采取通过字形记音,又通过记音达义的两步方式,而是采取了单音节语素物化的方式,^②把汉语变成了具象的可视语言,一步到位,直奔达义,与此同时,音由原语素的音转嫁给字形。^③这种特殊的物化方式,便决定了汉字既非音位文字,亦非音节文字,而是一种特有的音义一步到位的语素文字,并从总体上决定了汉字的表义系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

汉字的物化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物化成具象的可视形体,即成字,属单音节语素物化阶段;一是以所表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由成字转而回归到原来的单音节语素,属单音节语素物化回归阶段。前一个阶段,即物化阶段,包含着以人为本,象天法地,以各种造字方法取象造字的过程;后一阶段,即物化回归过程,包含着揭

示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成字不单单是个字形空壳,它具有自身的造义,叫做成字造义。成字的造义与所要表示的语素义并不完全相等,它只是导引人们与语素的核心义发生迁移联系,这个核心义也叫做义核。^④例如,“奪”的义核是“失”,段玉裁注为“失去物”,则更加显豁。成字由两个字素^⑤构成。一个是“奞”,由“大”與“佳”组合而成,在这里是个活性字素^⑥,《说文解字》的说解是“鸟张毛羽自奋飞”。一个是稳性字素^⑦“寸”,《说文解字》篆书从“又”(手),“寸”与“又”在古文字中往往可通用。把“寸”与“奞”组合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取象造字指向:“佳”从“手”中“张毛羽自奋飞”飞走了。故《说文解字》云:“手持佳失之也。”这个造字指向还并不等于语素的核心意义,而只是运用这样的成字造义来导引人们进行类比迁移认知;凡是原来有的或应该有的而现在没有了,都叫做“失去”,^⑧如“夺字”“夺权”中的“夺”,“掠夺”“剥夺”的“夺”,等等,其义核均为“失去”。又如,“刀”,甲骨文作,篆书作。这是以线条勾勒的刀形,上为刀柄,右为刀背,左为刀刃。其义核当为具有砍杀切削功能的一面刃工具,包括一切具有此类功能的工具均可称为“刀”,即使并非刀形的伽玛射线,也可凭借其功能而以伽玛刀称之。仅从上面两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体字还是独体字,其成字造义均同所表单音节语素的核心义相联系。

【作者简介】 李玲璞(1934—),山东文登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闾景忠《汉文文言教学艺术论》之李圃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李玲璞《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语言文字学刊》第一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

③ 朱德熙在第一次汉字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④ 王群主编《常用字引申义辞典》李玲璞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⑤ 字素是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构成汉字的结构要素。字素包含两个系统,一是静态的分析系统,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一是动态的功能系统,包括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详见李玲璞《说字素》,载《语文研究》1993年第一期。又见李圃1999年向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东亚语言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发表于《学术研究》2000年第一期;全文以《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⑥ 活性字素是根据动态的功能系统划分出来的,即静态系统中的字素在参与构造合体字的过程中,由原来的两个各不相干的静态字素临时组合成一个形音义相统的字素,如“大”与“佳”在静态字素系统中分别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字素,而在参与造合体“奪”字中却是由“大”和“佳”临时组合成的一个动态的活性字素“奞”。

⑦ 稳性字素也是根据动态的功能系统划分出来的。这类字素指静态系统中的基本字素或准字素在参与造合体字中仍然保持原来相对独立的形态,如篆书“又”中的“又”,楷书“奪”中的“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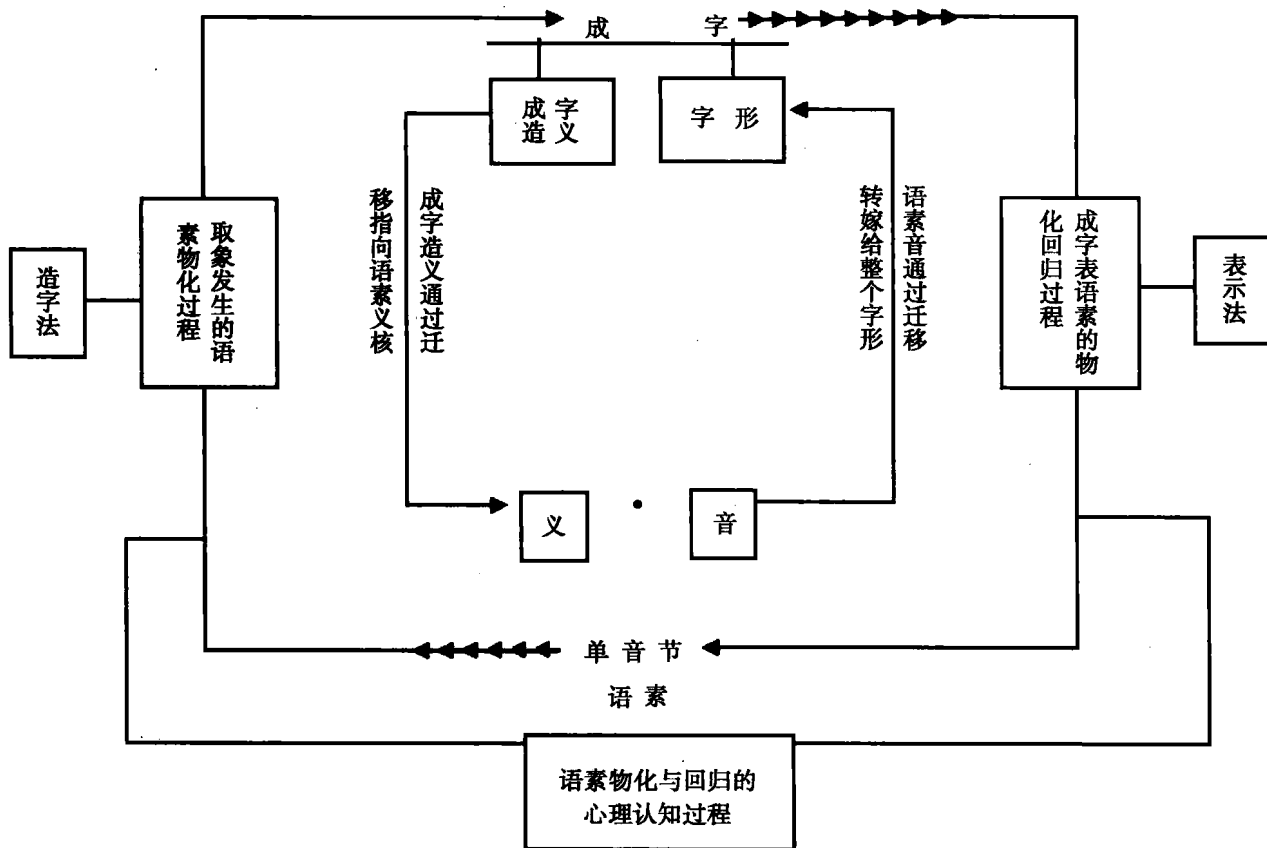
⑧ 此处采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奪”字条下注语:“引申为凡失去物之偶。”此处之“引申”应看成是成字造义向所表语素义核的迁移联系。

前面只谈了成字与语素义的关系,至于成字与语素音的关系则比较特殊。其特殊之处在于,成字的音从本质上来说是语素音的转嫁。汉字与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语素的音既然转嫁,就是语素音的完整的转嫁,到了成字中,也是整个字的读音,独体字是如此,合体字也是这样,即使合体字中的某一个字素,只表读音,或者表义兼表音,也只是发挥对被转嫁来的语素音的一种导引,同样是从整体上表示整个汉字的读音。从汉字的应用方面看,则更加显现出上述的特点,同样一个成字,表示通语雅言中的单音节语素时的读音与表示方言土语中的同一个单音节语素时的读音差异很大,这就更加证明了上述的这一特点。

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义核的联系究竟是通过甚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要考察成字如何向所表语素回归

的物化回归过程了。从认知方面来说,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汉语中被表示的语素意义,从整个义项群的义项系统中去寻绎语素的核心意义,然后观察成字及其造义用甚么样的方式表示语素的核心意义,即观察成字(包括独体字与合体字)内部稳性字素或活性字素如何在语素核心意义这个层面上参与表义的。由于方式的差异,可以把表示法分为六种。约略说来,大体不外象形表示法、指事表示法、形意表示法、会意(包括会意兼声)表示法、形声表示法和借形表示法。^①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造字取象(造字法)到成字造义,又从成字造义到造义表语素(表示法),即以语素为出发点,物化语素为字,又以物化了的字回归到归着点语素,恰恰走了一个完整的全过程。图示如下:



由于汉字的本体功能是表示汉语单音节语素的,因而在认知方面就向人们提出了特定的要求,这就是,语素的物化和物化回归的全过程中人脑活动的内容、特点和规律,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心理认知系统。这个人脑活动的全过程并非文章的谋篇布局,也不是诗词所追求的万千意象,而是沿着充分理解语素音义为出发点的路线,把隐性的概括的语素义和一发即逝的语素音转换成直观具体的物象,并通过物象的导引回归到语素,构成“形→义·音→形”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字形与字义字音三位一体的“字”。这个物化与物化回归的全过程,即以显示语素为出发点,又以显示语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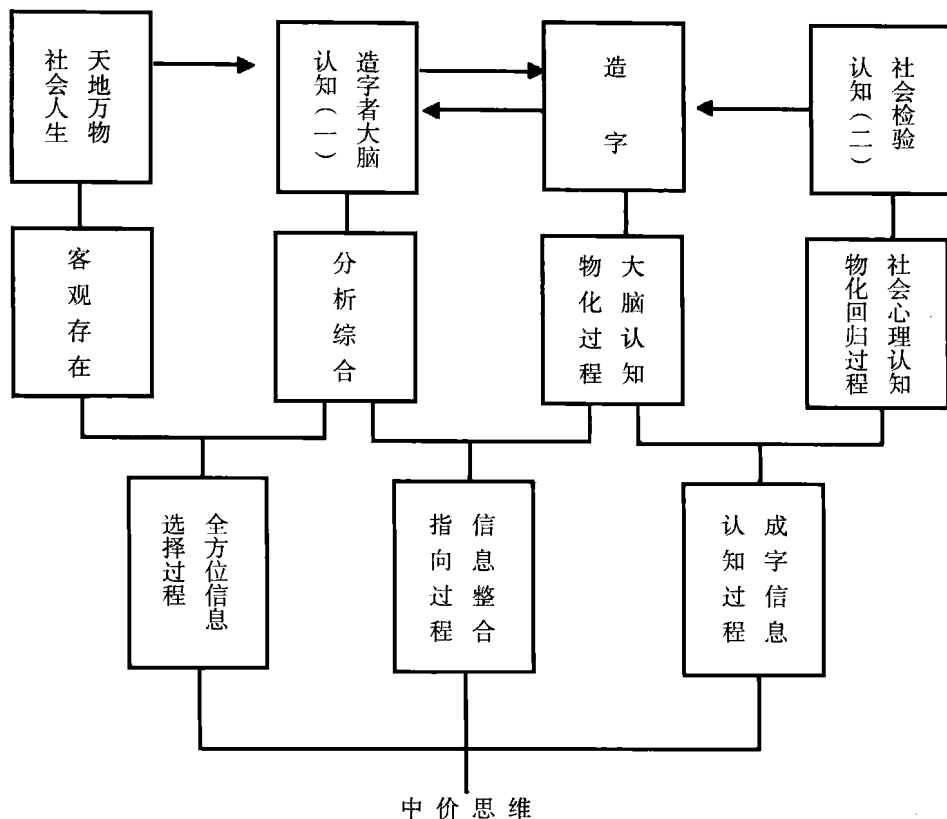
归着点的思维全过程,我们把它称作“中介思维”。归纳起来,如下图所示(图见下页)。

这个“中介思维”所使用的主要是“迁移认知”原则。从以单音节语素为依据去迁移取象,到取象迁移造字,从成字迁移造义,到造义迁移表示语素,全过程无不贯穿着迁移认知原则的运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要了解口耳相传的有声汉语成为可视性的汉语书面语,就必须考察单音节语素物化与物化回归这个从语素中来又回到语素中去的全过程,这是我们认识汉字本体功能的出发点,是汉字学领域诸多问题认知的出发

① 参见李圃《甲骨文文字学》第七章和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学林出版社1995年。

单音节语素物化与物化回归的心理认知过程①



点,也是汉字学理论系统构建的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个出发点称作“汉字学元点”。

汉字学元点与汉字学领域诸问题

由于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其基本语言单位的,因而表示汉语的汉字相应也便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汉语中的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以实现其表示汉语的本体功能,这就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上为汉字学元点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根据。如果从这个元点理论的功能方面来看,在纵横交错的汉字学领域诸多方面,元点总是处于观察、分析、解说和评价的轴心地位。

元点的轴心地位在汉字学系统方面大致表现为:以元点为轴心,区分表示通语雅言的正统文字系统和表示方言俗语的方域文字系统;以元点为轴心,形成汉字学宏观系统中的三维子系统,即取象发生系统、本体结构系统和心理认知(亦称文化积淀)系统;以元点为轴心,与汉字学宏观系统相伴的是字素分析方法及其子系统,即字素的静态分析系统与字素的动态功能系统,等等。元点的轴心地位在汉字历时的演进方面则表现为:以元点为轴心,穿透历时的汉字分析,构建汉

字发展史,包括汉语正统文字发展史和汉语方域文字发展史以及与前二者相伴而行的书体艺术演变史;以元点为轴心,构建历时的汉字字样系统,包括汉语正统文字字样系统和方域文字字样系统以及与前二者相伴而行的书体艺术字样系统。

元点的轴心地位在字义系统的分析中则表现为:从考察单音节语素如何“物化”的过程入手,包括为造字而迁移取象,又从迁移取象到成字造义,形成特有的造字法,②接着考察物化的成字所造之义如何向语素回归的过程,即成字造义用什么样的方式同语素的核心义相关联,形成特有的表示法。由于核心义始终居于字义系统的核心,所以有必要作简要的说明。如“顾”,《说文解字》:“还视也。”甲骨文作,以鸟转头看的与取象,即:“雇”;后世加“页”作“顾”,从页从雇,雇亦兼声,以人回头联系语素核心义“转头看”。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用的就是此义,及至三顾茅庐、奋不顾身、不顾廉耻中的“顾”俱为引申义探望、拜访、照看、照管,甚至虚化为转折语气“反而,却;不过,只是;难道,竟然”义的“顾”,也存在着还转义的影子。可见,核心义总是或显或隐存在于各个义项之中。又如“乍”。“乍”之取象当为古时祭祀祈福所用的牺牲腿肉中最为结实的那束纤维粗壮之精肉的纵剖形,甲骨文作或,尚存初形。《说文解字》收有“𠂔”字,云,“祭福肉也。”殷商甲骨文文例作: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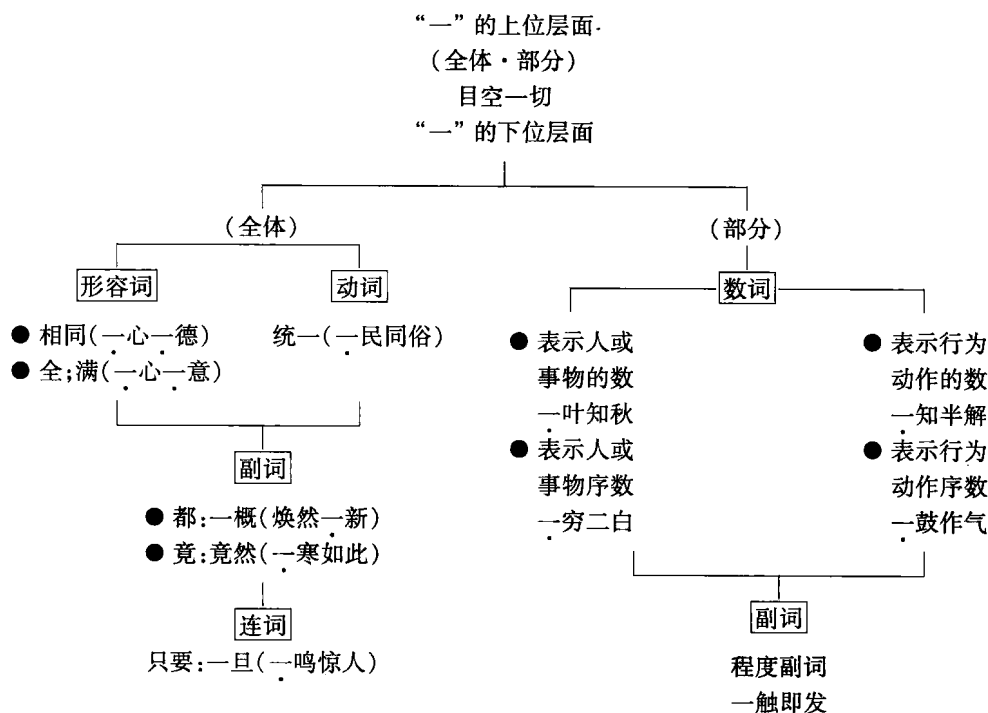
① 汉字的心理认知问题是汉字文化学十分关注的问题,可参见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古汉字与中华文化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参见李圃《甲骨文文字学》第三章和第四章“甲骨文字的造字法”,学林出版社1995年。

𠂔𠂔𠂔𠂔𠂔(庚申卜,争贞;乍<𠂔>太丁?)^①由于这块肌肉结实而暴发力强,可以使肌肉迅速隆起,故而以象之迅速隆起比况语素义核义。肌肉发达而隆起可称“乍”,如“腰圆膀乍”的“乍”指肩膀三角肌之隆起。突然受到惊吓而汗毛竖起,可以说成“汗毛乍”。迁移引申之,凡兴起可称“乍”,如殷商甲骨文中常见的“乍祸”,后世加素造字作“作”,如“兴风作浪”的“作”,所谓造字分词,让“作”所表示的语素义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语素。伴随着隆起的是时间短暂,故由空间迁移指时间短暂,如“乍行乍止”,指忽然、骤然;“初来乍到”,指刚、初。以“乍”^②为语源,加素造字分词的“炸”,则兼有空间的扩大时间的短暂,这已是另外一个字所代表的另

外一个语素了。

汉语词义有同步引申,^③字的核心义往往也不是单一的,“乍”明指空间密度大和空间距离大而隐含时间短。有些字则在义核同一个平面上充分体现了所表语素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核心义。如“一”。《说文解字》:“一,唯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后世多认为许慎以阴阳五行观念说解汉字而不予采信。其实,许慎整句的释语却道出了“一”与“万物”的关系,隐含着全体与部分的核心义。我们以汉字学元点理论加以考察,“一”字义项群从整体上显示出,其核心意义为“全体”与“部分”的合。现就“一”字义项群中的主要义项摘录于下:^④



汉字学元点理论不仅在汉字学理论系统方面表现出它的轴心地位,在记录汉语表情达意的用字方面也同样处于不可或缺轴心的地位。

表示同一个语素,可能使用着数个为这同一个语素所创制的字形形体,这无疑属于异体的选正与辨异问题。人们往往把这种异体现象归纳为:意义相同,读音相同,任何场合都可以互换。如果我们运用元点理论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表述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即“意义相同,读音相同”必须是同一个语素(音义的结合体),而不是几个语素相同,因此,“可以互换”。此其一。其二,相异之由来,即辨其相异及其由来。这仍然强调它们所表示的是同一个语素,由于在“物化”过程中造字取象的差异,取象成字的差异而创制了几个不同的形体,有些异体在“物化回归”过程中所使用的表示

法也可能有差异,故而对着已优化选择并确定了的正体而言称其它形体为异体。浑言之,统称异体字。还有一种社会用字现象,被称作繁简字,即同一个语素所使用的字形有繁体与简体之别。这种现象也同样应接受元点理论的考察与验证。一些寻绎简体字形源的著述,只寻绎到了历史上何时何载体上出现了某个简体字的字形,以说明现行的简体字形其来有自。其实,这还只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流而不是源,它的源除少数例外,大都是在正统文字结体的基础上的省减变化。如简体字“龙”。^⑤现在我们用元点理论来加以考察,在取象发生的“物化”阶段上发现,龍、鳳、鵬同出于一源。^⑥这三个字都源自人们头脑中想象的一种神物,即把我们今天仍称作“龙卷风”的自然现象当成了神物。这种“神物”因水而

① 李圃《甲骨文选注》二十二《王作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本文以◀▶符号标示语素。

③ 许嘉璐《论同步引申》,《未辑集——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摘自常青《说一——兼谈“一”字义项群的排列》,《辞书研究》1989年第二期。

⑤ 字样采自《二十世纪中国方域文字谱》(未刊稿)。

⑥ 李圃《甲骨文选注》二《出虹》篇“出虹”条注释。

起,所到之处,拔树倒屋,人死畜亡,威力无比,因而由敬畏迁移为崇拜,又由祈求化凶为吉的崇拜,迁移而为吉祥物,进而把这种吉祥物迁移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龙”的传人引为自豪。“龍”字,殷商甲骨文作或作,龙首加玉串“朋”;周金文作,更“朋”爲“辛”,表示花纹光彩;战国秦文字作,加彡表花纹文彩;秦汉篆书又加占卜的“卜”而成;楷书据篆书釐定为龍,一脉相承,以迄于今。草书写意,作。《说文解字》:“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鳳”字即古“鵬”字。殷商甲骨文作或作,可分别釐定作、,方域文字周原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鵬”,鳥在上,朋在下,作。这也就是见于《庄子》的鲲鹏之“鵬”。《说文解字》未收“鵬”字,而包容在“鳳”字条内,从所收古文形体便可窥见同源之端倪。许慎对“鳳”的说解是:“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纹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可以看出,许慎的说解已继承了龙凤呈祥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了。问题再回到简体“龙”这个方域俗字上来。“龙”这个形体甚明,是截取了草书的右半楷化成字的,殊不知,这恰恰是把龙头斩掉而只保留了一条龙尾巴!显然,此举不符合汉字取象发生的物化规则和成字造义的造义理据,破坏了成字造义同语素义核之间之联系,违背了汉民族龙的传人的审美心理,一言以蔽之曰:全面背离了汉字学元点理论。

同一个语素所“物化”的成字时分古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今字。如“甘”“𩚑”(其)。训诂学上常用的古今字术语,多为两个不同的字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语素,它们之间仍保留着渊源关系,如“其”与“箕”。这类字的初文形体往往通过语素之间音的相近相同而被虚语素(多为表语法关系意义)久借不还,于是后起字便专事发挥表示原语素的功能。这已属于形声义相统一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了。凡是字与字的关系之分析,也不能或离汉字学元点理论的考察,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分清字的本体功能与应用功能的差异,因为前者认知的是汉字的本质,而后者认知的是汉字的现象。假借字、通假字,或混言假借而析言假借、通假,乃至同源字、同形字、同音字、同义字,等等,这些文字现象的认知,都必须接受元点理论的考察与验证,才能弄清上述各类文字现象质的规定性。

个体汉字与群体汉字这些局部的文字现象乃至文字学领域内部各系统都离不开元点的考察,即使总结汉字的规范标准,汉字的优化选择标准,等等,也都必须重视元点理论的轴心地位。

从以上举例性的说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学元点理论确实像一个中轴一样,维系着整个汉字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

把握汉字学元点理论, 走出汉字认知误区

汉字认知误区多多。笔者从事汉语文字学教学与研究

数十年,常有蓦然回首,原来走在误区中之叹。形成误区众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客观上,汉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历经数千年,汉语正统的和方域的语音语义多有变化,而汉字却始终与它们相伴而行,这就同时带来了它的模糊性。要对具有包容性和模糊性特点的汉字作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便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第二,学术界对汉字学理论的关注不够,千百年来让六书条例唱了主角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许慎文字学思想的深层探究,加之后世西学东渐之后的套用搬用领了风气之先,使得汉字学这类实证性学科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前一个世纪虽然出现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文字学著作,但其主体仍属于汉字解读性的论著,尚缺乏系统性体系性的理论构建。鉴于上述原因,符合汉语汉字实际的汉字学理论系统始终没有面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及早走出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

择其要者,汉字认知误区有如下数端:汉字起源,多歧亡羊;六书条例,张冠李戴;拘泥字形,曲解字义;任意析形,南辕北辙;主从颠倒,舍本逐末;混淆性质,鸠占鹊巢;两脑不分,以桃代李;不明系统,名实错位。

误区之一:忽视汉字取象发生的理论研究,割裂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误以自然界物种起源的理念说解汉字的起源,结绳说、八卦说、契刻说、图画说,不一而足,形成多歧亡羊局面,把汉字取象发生研究引向歧途。

误区之二:忽视汉字造字取象——成字造义——造义与语素意义相关联的理论研究,造成张冠李戴,倒果为因,误把成字的表示法当成汉字的造字法,致使长期以来汉字造字法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

误区之三:不明成字与所表示的单音节语素义核之间的关系,误把显在的具有直观具体性的字形与隐在的具有概括性的语素义等同起来,拘泥字形,曲解字义,给汉字的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误区之四:不明汉语节律性与汉字节律性的特点,脱离汉语对汉字的制约作用,忽视了汉字结构成分的动态功能系统,任意析形,南辕北辙,把立体的汉字平面化,破坏了汉字表示法的理据性。

误区之五:缺乏汉字本体功能的认知研究,误以书写上的笔划多寡为评价汉字的主要理据,颠倒了汉字本体功能与社会用字的主从关系,破坏了汉字的本体功能及其优化原则。

误区之六:混淆汉字本体结构与书体艺术的差别,长期以来,误把书体演变史当成了整个汉字的发展史,影响了中国文字发展史的理论探索和发展规律的揭示。

误区之七:混淆了计算机与人脑的根本区别,以目前计算机的单纯汉字复形技术代替人脑的心理认知,破坏了汉字习得的人文性及其认知规律。

误区之八:忽视汉字学系统性体系性的理论建设,长期以来,把属于汉字学局部领域的文字现象当成了具有系统性的汉字学整体,导致了名与实相左,干扰了人们对汉字认知规律的应用。

要指出汉字认知误区之所以为误区,如何走出这些认知误区,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承担得了的。现仅就个别问题谈一

些粗浅的认识,示例发凡而已。

关于“字典”。

历史上已亡佚的以字典命名的字典不计,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是清代的《康熙字典》。此后,尤其是二十世纪,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小型中型大型字典;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小型中型大型词典。顾名思义,词典是解释语词的音义和用法的,因而名副其实。可是,考察一些冠以“字典”名称的工具书,却并不解释字与词之间的关系,而同样是解释词的音义和用法的,与“词典”的差别仅在于前者解释语词,包括单音词、复音词和带有固定词组性质的成语典故等;后者则专事解释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单音词的音义和用法,这哪里是字典,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单音词词典。其实,字典蜕变为单音词词典,不自清人始,早在南朝梁野王的《玉篇》就已改变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开创的编纂体例,将许慎说解文字的一整套说解法式一概省去,使“字”仅仅充当了空灵的形体标记,与词的音义完全脱离了关系。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未改观。汉字学元点理论告诉我们,字典词典,就是说文解字的,既是说文解字的,就必须遵循单音节语素(义与音的结合体)取象物化成字,又由物化成字的造义向所表语素回归的路线,揭示字形结构同语素音义之间的关系。

这样才能做到名至实归。这种名为字典实则词典的名实错位现象不仅表现在汉字学领域,也同时反映到了语言学领域。

也还是“字典”这个话题。

甚么是真正的字典?我们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真正的字典。这部著作并未以“字典”冠名,而是以字典的释语“说文解字”冠名:字典者,说文解字之“大册”也。《说文解字》历经千年,至今仍为案头必备的语文工具书,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时至今日,《说文解字》仍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释字“大册”。一些出土古文字分类字典,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等,都是继承了许慎的编纂体例和说解方法编纂而成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人们一提到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往往想到的是他的《说文解字·叙》。其实,更加可贵的倒是他的全书编纂体例背后所表现出的文字学宏观理念的把握和文字分析方法的运用。只要运用汉字学元点理论加以分析验证,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位五经无双的许圣人,^①确实是汉字学千古第一人。

^① 许嘉璐先生告诉笔者,许慎故里民众称许慎为“许圣人”,代代相传,以至今。

汉字发生研究目的论

王元鹿

【摘要】 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以前的相关研究显得分析过粗和视野过狭。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把研究目的作更细的分析。而汉字发生研究问题的真正解决,依赖于若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汉字发生;目的;原始汉字

若是我们向古往今来即便都是现代的汉字学者尤其是对汉字发生问题进行过专文论述的汉字学者进行发卷调查以征求“什么是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答案的话,我们毫不怀疑,收到的答案会不很一致甚至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在此为这些虚拟的学者们草拟几份可能的答卷:

- A. 了解汉字发生的时间。
- B. 了解汉字发生的地点。
- C. 了解汉字从何而发生。
- D. 了解汉字因何而发生。
- E. 了解汉字是何人所造。
- F. 了解汉字如何发生。

以上6个答案,正应了 when、where、what、why、who 和 how 这历史科学的6个w的分析。

当然还有:

- G. 了解祖国与汉民族文明历史之悠久。

显然,G所答是一个间接的目的,并不与我们要研究的题意相符合。

那么,在上面的A、B、C、D、E和F中,究竟何者是最合理的答案?

其实,肯定会有一些学者在其答案中包罗了A、B、C、D、E、F或包含了A、B、C、D、E、F中的某几项。

因此,这答案应该说是比较完整了,至少是在理论上。

然而,问题在于:看看过去的学者们的研究,又有谁真的回答了以上6方面的问题或对以上6方面的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

回顾以往的汉字发生研究,学者们确乎力图在以上6方面找寻答案,然而寻得的答案往往并不包罗以上这6个方面。

就以郭沫若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①为例。该文的主要部分确乎包含了 when(时间)(讨论了半坡陶符的C14同位素测得的时间至今有六千年之久)、where(地点)(在西安半坡)和 what(什么)(讨论了最早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并未讨论 why(为什么)和 who(即谁是造字者)以及 how(如何发生)的问题。我们不能说郭沫若的这篇文

章由于未对6个w作出讨论就是无意义的,甚至不能说它不完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于汉字发生的研究这样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以前的专家未必能也未必曾在全面研究上做得很完美。

进一步说,若是一篇文章真正对上述的6个w进行了全面的研讨,也未必能认为它就是穷尽性地研究了汉字发生的所有方面。

先从纯理论或纯逻辑的角度来说明我们的思路。

应该说,任何一个小的课题,都有对它进行多次切分的可能性。拿汉字发生问题来说,上述的6个w的确是整个课题的第一次切分。然而,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进一步进行切分。比如,对于 what(什么样),可以理解为最原始的文字从何而来(from what),亦可以理解为最原始的文字怎么样(what)。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再切分,表面看来或是由于我们对 what 的理解不同,而且 what 本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实践上看,这 what 是可以再加切分的。

一种通常的认识认为,东方人的思想方法较重综合,而西方人的思想方法较重分析。尽管在文字发生的研究中西方人的分析方法并未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还是不幸地发现:至少在汉字的发生的研究中,东方人过于重视综合而相对地忽视分析的做法,确实是显现出来了的。

综观百年来的汉字发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般学者特别注意的是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一)汉字发生离今天有多久;(二)最早的汉字是哪一种符号系统。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但是严格说来:(一)这两点并不是全部的目的;(二)就这两点而言,亦可分别进一步切分。如汉字发生的时代可能有几个,因为未必只有一种原始汉字为汉字之源;既然字源未必只有一个,因此对所谓“最早的汉字”亦须一种一种分开来研究。

如果回到研究实践中来,那么从汉字发生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也确乎值得且必须重视重建汉字研究的目的。

从汉字发生的 what(什么)来看,至少这 what 可能意味着这么一些东西:指汉字的渊源物即汉字发生之前的东西是什么;指汉字原始的状态即汉字发生瞬间的东西是什么。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文字与其他民族古文字同义比较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民族古文字资料库与电子辞典”。

【作者简介】 王元鹿(194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奴隶制时代》,244-27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

外,若换一个角度看,很可能这 what 是一个复合的东西。依郭沫若等不少学者之见,半坡和大汶口的文字分别为汉字之源,前者是指事字的源而后者是象形字之源,那么,汉字的来源至少有两个符号系统。再说开去,若是从文字作为符号系统的特征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是对汉字的渊源物是何类事物(如结绳、契刻乃至八卦)的认识,那么,也许其渊源物也是多种事物的合成。

以上的讨论可以总结为:如果我们全方位地从理论角度去切分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那么,这目的可以进一步分析。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先前做得不够的。

从另一方面说,随着对汉字发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还了解了更多的东西也属于或可以属于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于是,可以认为,研究的目的不仅可以从内部再切分,还可以从外部再增益。

比如,上面所述的关于汉字可能产生于异时异地的认识,即认为原始汉字的状态不止一种。

又比如,随着咱们对汉字发生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逐渐发现,汉字的发生并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它至少包括准备阶段、发生阶段,而这发生阶段又不仅仅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随着这一认识的建立,我们就必须把汉字的发生过程作为一个历史作动态的描述。再进一步说,如果认为汉字发生的瞬间不易探知但可以通过早期汉字的状态来回溯,那么,对早期汉字的研究,也可以作为汉字发生研究的一个部分了。

再比如,对于汉字发生动因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深入的理解。传统的说法往往认为文字产生的充要条件就是奴隶制国家的产生。然而,用这一学说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某些古代民族(如马亚)中文字产生于具某一性质社会而在另一些与之社会条件相似的古代民族中(如印加)却未产生文字。

这样的历史事实至少启发我们:社会历史条件并非决定文字产生的惟一条件,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动因,须向多方面去寻觅。

还有,即便就分析而言,随着文字发生与汉字发生研究的进展,原先看似毋需分解的一些有关汉字发生的问题,也必需分析开来才能去做好。比如,关于书写工具与书写手法对于原始文字书体的影响,以前是一个汉字发生研究者几乎从不涉足的问题。然而,苏美尔文的研究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泥版烘焙工艺的开始,苏美尔文从其发生后的较早期就进入了笔画较简单的时代,楔形文字的发生正是这一广义书写工具与书写方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与之相应,我们亦应该去研究原始汉字的书写工具与书写方法对原始汉字书体的影响。

此外,某些在汉字发生研究中经过多次尝试而仍得不出仔细结论的题目,也促使我们把相关的题目研究得更细更深更透,非如此便无法解决一些“千古谜团”。举例来说,对于汉字的发生前瞬间的状态的描写,尤其是动态描写,一直是研究者们希冀做到但不易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必须指望与

之有关的纵向与横向的研究的进展来启发这一谜团的解决:所谓纵向,即把汉字和发生后的状态与过程弄清;所谓横向,即尽可能取得国内少数民族或同外民族有关文字发生的状态的材料,再来启发汉字发生研究中对相应问题的认识。

最后,还可以认为,与汉字发生研究相关的学科的发展,给了汉字发生研究许多材料上的依据、方法上的启示和观点上的指导,从而拓展了汉字发生研究的视界并增益了其研究的对象。比如,比较文字学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进了汉字发生研究。裘锡圭先生依据纳西东巴文这种较为原始的文字的状态来推测早期汉字的某些特征^①,王元鹿亦在依据东巴文字拟测早期汉字状态上做了若干尝试^②,尤其是在早期汉字一字多音节的问题上,裘锡圭和王元鹿二人所依据的材料类型和性质不同,论证的过程不同,但殊途同归地取得了几乎同样的结论。这些工作使得上古汉字在出土资料不多、典籍记载简略的情况下,依然得到了概貌构拟的可能。这样的研究就使得概貌拟测、系统重建的工作也归入了汉字发生研究的范畴中去。

总结以上关于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讨论,我们达到了以下的初步认识:

(一) 以前的关于以 6 个 w 为研究目的认识,失之分析过粗和视野过狭。

(二) 随着对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认识深化和对以每一相关课题的研究的深化,我们可能把以 6 个 w 为分析依据的各个分领域的目的进一步分析,得到在这 6 个 w 以下一层的若干“分目的”。

(三) 随着对与汉字发生研究相关的若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的取得和资料的获得,汉字发生研究的视野可以进一步扩大,从而有些在 6 个 w 之外的目的可以得到增益。

(四) 由于汉字发生研究的某些难题总是得不到解决,就必须进一步分析和进一步增益若干新设目的以求为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总括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相信,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设立必须也正在走向对每个目的分析更细并设立更多的目的的阶段。

就目前的研究水平的现实,我们可以把汉字发生研究的传统上的 6 个 w 的目的作如下新的分析:

(一) when(时间):

1. 从大致上探求汉字发生的朝代与时代,包括该朝代与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
2. 探求每一种可能为汉字原始状态的出土文物所处的时代,包括该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
3. 探求与汉字发生相对应的我国少数民族与外国古代民族和原始民族文字发生的时代。

(二) where(地点):

1. 探求汉字发生地点大致可能处于的范围。
2. 探求汉字发生于一处还是多处。
3. 探求原始汉字出土文物所处的地点。若地点为多处,则进而研究它们的系列或序列关系。

① 参见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162-171 页。

② 见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8 月。

(三) what(什么):

1. 研究汉字发生之前的准备状态,主要是作为原始汉字的渊源物的状态。

2. 研究可能作为原始汉字的符号系统的性质与状态;如有多种,研究它们间的联系、关系与区别。

3. 研究早期汉字乃至进入表词-意音文字阶段的汉字的状态,找出它们与原始汉字之间的联系、关系与区别。

4. 构拟和重建原始汉字系统。

(四) why(为什么):

1. 研究汉字发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动因。

2. 研究一般文字发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动因。

(五) how(如何):

1. 比较汉字发生准备阶段与汉字发生瞬间之间的异同,从而对汉字发生的瞬间进行描述。

2. 比较汉字发生准备状态与原始汉字状态,从而发现汉字发生时的状态并进行描述。

3. 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文字发生的过程并在汉字发生过程中寻觅相对应的现象与特征。

(六) who(谁):

1. 研究汉字创始者是个人还是集体。

2. 探求创始汉字的古代民族的族属。

3. 依据出土原始汉字文物探寻其作者。

虽然上述讨论及其结果可能有失之空泛之处,但是依据上面设立的6项中可分若干小项的事实即可发现,以前对于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设立是注意得不够的。尽管我们绝不可要求每一项研究、每一篇论文都对这些小项进行周密的讨论,但我们至少可以希冀每一位汉字发生的研究者必须顾及和重视每一小项中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一位研究者的每一项研究尽可以从他的独特的视角、独有的兴趣与材料及他个人企图解决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汉字发生问题的全面突破,恐怕尚需期待许多研究者的各自独特研究的综合结果。换言之,汉字发生研究问题决不是一个只凭一、两篇论文可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即使把以上各项与各小项所设的目的研究清楚了,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汉字发生问题研究透彻了。这是由于:

(1) 以上各小项是举例性的而非穷尽性的。

(2) 以上各大项只是传统的与逻辑的分类,我们尚未把由于各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可以增益的研究领域补充列入。

(3) 对以上各小项的研究尚需一个综合的过程。而这种综合绝不是一两个简单的结论。随着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分析和增益,它必然发展成为一门汉字学的子学科或文字发生学的子学科,这门学科的基本观点将会不断增加,其基本内容将趋于愈来愈丰富。

(4) 以上各项与各小项的开列,作为体系来说,不是封闭的和静止的,而是开放的和流动的。换言之,这些项和小项绝不是穷尽性的和一成不变的。至少,这些小项是举例性的,而且在所列的大项之外也有可以讨论的种种课题。随着

汉字发生研究的深化,各小项的进一步分析和其他课题的进一步增益乃至各大项间、各大项的下位小项间的结合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以上的讨论,可以说是对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理论上的分析。然而已往的汉字发生研究实践往往并不如此理想化,即使今后的汉字发生研究领域中的论文也不可能写得如此教科书式。因此,我们也不妨在本节之末依据已往汉字发生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开列出在目前状况下需要解决的或彻底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

(1) 汉字的发生时间(朝代和年份)。

(2) 汉字发生于一地区还是发生在多地?若发生在多地,则它们之间的联系如何?

(3) 汉字的渊源物是哪几类?它们之间关系如何?

(4) 汉字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5) 原始汉字(即处于发生瞬间的汉字)是什么样的?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6) 汉字发生的过程是如何?

(7) 汉字的创造者是个人还是集体?

如果结合以往百年的汉字发生研究实践,我们也可以列出以下一些相当实际并更为具体的问题来,这些问题可以说是被热烈讨论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汉字的发生时间是否确在夏代?

(2) 如何看待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的性质?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是什么?

(3) 如何看待大汶口陶器符号的性质?它们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符号是否属于同一系统?

(4) 仰韶和大汶口的陶器符号能否被考释?应如何考释?

(5) 除仰韶和大汶口陶器符号之外,另外一些夏代的陶器符号系统哪些属于文字、哪些属于前文字?

(6) 长安花园村出土的夏代骨器上的刻划符号是否是文字?

(7) 贾湖刻符是否是文字?

(8) 商代前期的江西吴城陶器符号和河北藁城台西陶器符号是否是文字?它们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有何联系?

(9) 陶符与陶文是否有绝对的界限?

综观以上所论,我们在讨论中把汉字发生问题列表3次。事实上,这3张表中的每一张表的问题的总体,基本上是相等同并相一致的。其区别在于:第1张表是理想化和理论化的,第2张表同样比较理想化和理论化,但是可以说是抽取了第一张表中所列问题中的一些关键和困难问题;第3张表则是相当具体的问题的罗列。可以说,在现时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下,既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解决理论上的所有问题,亦不可能解决所有实际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既可以从理论问题入手,亦可以从实际问题入手,但其终极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使种种问题得到答案。当然,相应的研究过程必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

汉字造字理论新说

梁 光 华

【摘 要】 论文对以《说文》为代表的传统“六书学”“四经二纬说”“四体二用说”、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和 20 世纪后 50 年出现的陈梦家、裘锡圭、刘又辛等三家“三书说”进行了研究述评,认为汉字的造字方法是形意、假借和形声。作者着重研究指出:形声造字法的形(意)符和声(音)符不是通过“加注”或“加上”得到的,而是通过假借的方法而得以借用的。假借法构成了形声法得以产生的直接原因,形声法实际上是假借原理和方法在汉字造字实践中应用的结果。

【关键词】 汉字;造字理论;假借法;形声法;因果新论

汉字造字理论,即汉民族为汉语词谋求书写记录符号法规 and 规律的科学,在中国是一门传统的学问。这门传统学问叫做“六书学”,以东汉许慎撰著的体大思精的不朽巨著《说文解字》为其代表。许氏《说文》在距今两千年的汉朝出现,开创了系统研究中国汉字造字理论的先河,成为中国汉字学的开山鼻祖,筚路蓝缕,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以《说文》为代表的传统“六书学”开创奠基和引导示范的研究,后世学者对汉字造字理论的研究将会延宕更长的时间,将会走更多的弯路错路,因此,我们应当对具有开创之功、传布之功和沟通古今研究之功的“六书学”给予高度的评价,应当感谢许慎《说文》对汉字造字理论和中国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

但是由于时代的历史的和汉代科学研究水平的局限,传统“六书”分类琐细庞杂,标准不一,精芜并存,难以规范和验证全部汉字,所以后世学人不断地对以《说文》为代表的“六书学”进行研讨、修订和补正,或在传统“六书学”的基础上另立新说,以求得对汉字造字理论的科学解说。较早对传统“六书学”提出异议的学者有明人杨慎。杨氏在其《六书索隐》中第一个把“六书”划分为“经”和“纬”两个部分:“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降至有清一代,清代学者万光泰在其《转注绪言》中指出:“六书四为体二为用,体不可离乎用,用不可离乎体。……转注、假借,二字皆用。”^①其后,比万光泰年轻而名震学坛的著名学者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对“四体二用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推阐。^②戴氏之著名弟子段玉裁

又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把戴震的“四体二用说”推崇到极致:“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今按:明人杨慎的“四经二纬说”,特别是清人万光泰首倡、戴震进一步推阐、段玉裁极力推崇的“四体二用说”,尽管流布深广,影响古今,但是笔者认为此二说如出一辙,强分“经”、“纬”,强分“字之体”“字之用”,排斥“假借”,惟字形是论,不符合汉字创制发展以记录汉语词的实际,因而理当扬弃。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唐兰先生将传统“六书”去三而留其三,建立了汉字造字法的一个新系统,即著名的“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③此“三书说”排斥假借造字法,分“象形”和“象意”,而唐氏自己对此二书又纠葛不清,不能自圆己说,整个“三书说”不符合汉字创制发展以记录汉语词的实际,因而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鲜有赞同承继者。

值得欣喜的是,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三家研究解说造字理论的新“三书说”。这就是:(1)陈梦家先生 1956 年研究认为,汉字造字法在殷商甲骨文时期就已完备,这就是“象形、假借、形声”,而且后世汉字仍然按照这三种方法和类型继续发展。^④(2)裘锡圭先生 1988 年基本同意陈梦家先生的“三书说”,但是作了一些修正:“我们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改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这样才能使汉字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里都有它们的位置。”^⑤(3)刘又辛、方有国二先生 2000 年提出了汉字发展为图画文字(商代以前)、表音文字(商代至秦)和形音文字(秦汉至现代)的三阶段说,提出了汉字造字法为“表形、假借、形声”的三书说。^⑥笔者认为,作为汉字造字法研究的理论总结,这三家三书说大同小异,都是在传统“六书学”和前修时贤广泛研究基础上的新发展,都一致认为假借是汉字创制发展中一种重要的造字方法,都注重揭示汉字创制方法

【作者简介】 梁光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院长、教授,贵州省语言学会副会长。

① 转引自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第 231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② 推阐过程详见《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渭南严氏刻本。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 78 页,开明书店 1949 年 3 月版。

④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文字章》第 76 至 80 页,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7 月版。

⑤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 106 页,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8 月版。

⑥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20世纪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此三家三书说中的“象形”“表意”和“表形”,笔者以为定名为“形意”,更能概括、反映汉民族先民创制汉字之初特别重视依类象形、以形示意的创制思维特征,更能概括、反映汉字“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法和“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表意法在造字方法上的共性特征,更能概括、反映汉字从远古图画文字到象形、表意文字阶段的演进规律。让“形意”“假借”“形声”三种造字法并列,形意可以突出其表形表意法的共性特征,假借可以突出其借音借形法的本质,形声可以突出其兼表形音法的特质。形意法代表的是汉字向形意方向发展的道路,假借法代表的是汉字向表音方向发展的道路,形声法代表的是汉字向兼表形音方向发展的道路。形意、假借、形声三法囊括了汉字全部的造字方法,也客观地反映了汉字造字法先后产生的历史顺序。这三种造字方法综合使用,重点向兼表形音的方向发展,可以创制出无穷无尽的汉字来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

二

形意法创制的汉字直接表示记录汉语词的意义,不表示汉语词的读音。形意法是汉字造字法中最早出现的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仅有形意造字法造字是不能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的,因为汉语是一种发达的语言,汉语的词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的汉语词难于或者完全不可能用形意法来为它们造字。于是,汉民族上古先民必须谋求新的解决办法。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智慧而富于创造力的汉民族上古先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让汉字的造字法向借形表音记词的方向发展。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总结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造字法就是这样一把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可以顺利地解决形意法因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意可会而无法造字记词的矛盾,可以顺利地解决因形意法的局限而阻碍汉字发展的桎梏。例如:汉语读为“qí”的指示代词的语气词(姑以现代音为例说明),没有专门的书写符号(字)来记录它们,也即“本无其字”。本义为簸箕(竹器)的“其”(“箕”的本字)字读音也为“qí”,于是人们就把“其”作为同音的书写符号(字)借用来记录指示代词和语气词,从商代甲骨文借用至今而未专门造其本字。这就是“依声托事”。依照这个借用同音符号(字)来记词的办法,汉语量词“jīn”没有专门的书写符号(字),人们就借用本义为刀斧的同音字“斤”来记录。往来的“来”就是由本义为麦的同音字“来”借用而得以记录的。这种假借同音的书写符号(字)来记录汉语词的方法,是汉民族上古先民的一项发明创造,是十分精巧的不造新字而使汉语词得到记录、使汉字得以快速发展的造字方法,所以在殷商时期就迅速普及使用,而且普及使用率高得惊人。姚孝遂先生对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所收的

全部甲骨文进行统计,其假借字占到总数的74%(见《古文研究》第4辑,第14页)。刘又辛先生在其《汉字发展纲要》中研究指出:“表音字(假借字),这类字在殷代和西周约占70%以上;春秋战国时期,下降为40%左右。”^①故而刘又辛先生把殷商至秦的汉字总结为“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②就是在秦汉至现代的汉字中,假借字仍然为数不少。由此可见假借造字法的功劳之大,那些无视“假借”在汉字造字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而将“假借”排斥在汉字造字法之外的观点实在是没有道理。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在《与王子壮论假借书》中十分精当地指出:“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一例,则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数也,故依声而托事焉。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③可以这样说,对汉语中那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对那些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实词意义的虚词,以及用形意造字法不易创制或者不能创制出新的书写符号(字)来记录的汉语词,都可以采用假借的方法,借用同音的书写符号(字)来记录它们。可见假借法确实是创新解决形意法因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意可会而无法造字记词的一把金钥匙,使得汉字由早期的形意文字逐渐脱离纯粹的以形表意而朝着借音造字记词的方向迅速发展,使得汉字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

汉字造字法在形意法之后产生了假借法,使得汉字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借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记录汉语的需要。上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语法形态变化较少的语言,汉语的音节只有几百个。大量的假借字出现之后,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因同音假借而导致一字多用,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等多项意义并存于一体。字同音同而义异,无论是目治还是耳治都难于分辨识读,容易造成字义混淆。加上社会一天天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产生,人们的思维不断地向缜密、科学的方向发展,用形意法和假借法创制的汉字数量有限,难以适应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谋求新的造字方法。汉民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现,所要谋求的新的汉字造字方法,应该克服已有造字方法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形意法纯粹向意义方向发展而无法造出大量的新字来记录汉语词;二是假借法因同音假借造成一字多用,一字多义,字同音同而义异的假借字太多,又容易引起混淆,不利于分辨识读。新的造字方法应该在新造字中既兼顾表意,又兼顾表音,这样才能洞开汉字造字的新天地。许慎总结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造字法,就是汉民族上古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苦苦谋求到的能够促进汉字快速发展的最

①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②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③ 《籀编述林》卷十。